

# 理论的限制： 仪式理论与中共纪念史研究\*

王 昌

[摘要]许多研究者将西方仪式理论运用到中共纪念活动史的研究中，特别是在纪念活动的功能分析上，但其中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往往被忽略。仪式理论给研究者提示的新视角具开拓史料视野的意义，但仪式理论在历史因果关系的解释上颇为乏力，而中国传统的仪式文化也是研究者将西方仪式理论运用于中共纪念史研究中应当考虑的另一因素。

[关键词]仪式理论；纪念活动；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2)02-0025-11

中共纪念活动史是近年来党史学界颇为关注的新领域，也涌现出丰富的研究成果<sup>①</sup>。这些研究，梳理了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过程，分析了纪念活动在中共意识形态实践中的功能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共纪念活动的研究中，学者们引入了诸多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如仪式理论、记忆理论、符号理论等等。但研究者运用上述理论时，对于理论的适用性问题并不十分关注。本文拟以仪式理论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运用为中心，考察这类理论在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中的界限问题，以期为其他文化体系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中共党史研究提供一点参照。

## 一、当前仪式理论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运用及问题

对于中共纪念活动与仪式之间的关系，许多研究者都直接作出肯定性判断。如陈金龙在《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中，开篇便提出“纪念活动是一种政治仪式，也是一种政治象征，有其独特的政治功能。”<sup>②</sup>类似的论述还有不少，如罗国辉、邵雍的《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指出，纪念活动是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的一种仪式<sup>③</sup>；吴祖鲲、管玄同在《民族凝聚力视野下中共纪念活动的功能研究》一文中认为，仪式性是中共纪念活动的外在特征。中共纪念活动的仪式性，就是在一定的纪念日前后，按照一定标准布置的纪念场所，集中有序地呈现纪念要素，以营造浓厚的纪念氛围<sup>④</sup>；等等。

上述表述中所体现出的共同点在于，研究者均直接在中共的纪念活动与仪式之间做出肯定性判断，认为中共的纪念活动是一种仪式，仪式性是中共纪念活动的特征。但显然，这并非严格

\* 本文系2019年福建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中共早期海洋军事理论家郭寿生海权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FJ2019C003)的阶段性成果。

①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陈金龙：《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等。

② 陈金龙：《略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6期。

③ 罗国辉、邵雍：《略论抗日战争时期的孙中山纪念活动》，《广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④ 吴祖鲲、管玄同：《民族凝聚力视野下中共纪念活动的功能研究》，《理论探讨》2016年第3期。

的理论论断。仪式的一般定义,如《现代汉语词典》界定为:举行典礼的程序、形式<sup>①</sup>。其中的典礼,一般可认为是一种较为正式的、郑重的、有多人参与的活动。那么,中共的纪念活动可否与“仪式”抑或是“政治仪式”划上等号?再看《现代汉语词典》对纪念的界定: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sup>②</sup>。对比前引罗国辉、邵雍文章的定义,其表述乃是“纪念活动是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的一种仪式。”若以词典所界定的涵义,“中共纪念活动”可以是“中共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的活动”,而罗国辉、邵雍的表述则以“仪式”代替了“活动”。但是,“活动”所涵盖的范围显然要大于“仪式”。因此可以说,中共纪念活动中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仪式”乃至“政治仪式”,但二者之间显然不能完全等同。那么,哪些中共的纪念活动可以被称为“仪式”?也就是说,中共纪念活动应该具备哪些要素(如时间、空间、程序、参与人数等等)才可被称为仪式?在晚近以来中共纪念活动与仪式的相关研究中,显然还没有更加深入、清晰的解释。如此,以仪式理论为参照得出的关于中共纪念活动的功能、意义等等便可能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者夸大性。

上述研究者既然将中共纪念活动与仪式联系起来,并且肯定了二者的相关性,那么,将仪式理论引入中共纪念史研究便顺理成章了。与此同时,要从“仪式”视角对中共纪念活动进行进一步的解释,“仪式”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就成为研究者必须涉及的内容,这在逻辑上便可以进入仪式理论观照的历史领域。依此逻辑,如能对后者进行探讨,那么,中共纪念活动具有何种社会的或政治的功能,也就可以通过仪式理论的分析而更加清晰。

胡国胜的《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探析》<sup>③</sup>一文,是较早也较全面地运用仪式理论对中共纪念活动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文章首先认为“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代表着国家仪式,是利用纪念对象举行各种仪式,传播政治象征符号的活动。”文章引用郭于华主编的《仪式与社会变迁》中的结论:“政治仪式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是重要的,因为政治的权力关系无论在哪里都是经由沟通的象征方式而表达和改变的。”<sup>④</sup>既然是一种政治仪式,那么“作为一种政治仪式,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不仅仅是政治领导的需要,更多的体现在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保存历史记忆的需要、教育民众的需要、总结历史经验的需要以及中共自身建设的需要等。作为政治仪式的每种纪念活动之所以具有不同的思想内容和风格,与形势发展及政治需要密切相关。”文章还引用涂尔干的结论:“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sup>⑤</sup>此文进一步提出:根据组织文化理论,可以把这种纪念仪式分为进阶仪式、增进仪式、复兴仪式和整合仪式4种类型。进阶仪式中的入党宣誓仪式是用于新党员的社会角色和身份的转化。增进仪式主要通过表彰,提高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热情。复兴仪式是七一纪念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环,通过党组织的发展活动来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整合仪式主要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产生对党组织的认同感。

关于仪式与记忆问题,作者援引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的《社会如何记忆》中的结论,提出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人们用词语和形象向自己表现过去,以此保存关于过去的不同记忆,纪念仪式是它突出的例子,它们通过描绘和展现过去的事件来使人记忆过去。由于纪念仪式是在特定时间对某个历史事件或历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543页。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七版)》,第616页。

③ 胡国胜:《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④ 胡国胜:《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⑤ 胡国胜:《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活动探析》,《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1期。

史人物，通过在一个神圣场地的操练来纪念，仪式过程实际上是营造了一个使参与者自我反省并且能够与“他者”展开“对话”的空间，使得符号象征的社会功能得以发挥。纪念仪式可以使人们能够在仪式活动中达成共同的观念认同，通过纪念形成共同的集体记忆，并能将这种记忆的意义指向未来，引导人们为未来努力。

作者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将中共的纪念活动定义为一种“国家仪式”或者说是“政治仪式”，既然作为一种政治仪式，便有其目的与功能，如文中引涂尔干的“仪式首先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也就是说，中共通过纪念活动这种仪式来定期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作为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所需要论证的。进阶仪式、增进仪式、复兴仪式和整合仪式的划分方式，依作者所言乃来自组织文化理论。然而，以这四个角度对中共纪念活动进行划分，其依据如何？能否划分为更多的角度和方面？直接以外来理论带有的分析框架置于中共具体的历史事实上，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方法论层面均有明显的缺陷。如前所述，文章还引用美国学者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中的结论来说明仪式与社会记忆之间的联系。但是，不同的历史环境、社会结构、文化传统下的个体和群体在历史记忆的形成方面有着一定的差别。保罗·康纳顿的记忆理论也许在某些方面可以给我们以提示，但是其适用中共纪念活动研究的程度如何，恐怕还需要研究者更进一步的论证。

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的运用，有评论者曾指出：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上，虽然有助于推进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学术进程，但中共纪念史学本身的特殊性，能否用仪式理论、记忆理论、符号学理论有效而客观地解读中共的历次纪念活动，显然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认真考虑。尽管有学者已经提出多学科研究方法使用时需要把握有效性与有限性双重原则，并提出“在中国和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任何一种非中国的方法原则和理论框架都无法框定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甚至某一方面”，但目前看来，研究者在运用仪式理论、记忆理论、符号学理论对中共纪念活动史的研究中并没有完全关注其双重原则，而更多的是为了运用而运用<sup>①</sup>。或许由于文章篇幅所限，上述文章在引用西方的仪式理论、记忆理论时，并没有分析、解释引文的背景，对西方理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给中共的纪念活动以启示也缺乏相应的论证。

陈金龙在《中共纪念活动与党史文化的建构》一文中提出了仪式在党史文化建构中的作用。文章的第二部分“纪念仪式：党史文化的行为方式”中提出，“仪式以特定的精神信仰为基础，表现为一套象征性与表演性、例行化与固定化的行为方式，构成人类文化的重要方面，中共纪念活动有其独特的仪式安排，无论非常态的追思仪式，还是常态化的庆典仪式，都有总体设计和具体谋划，构成纪念仪式的基本规定，成为党史文化的行为方式”，并且“纪念蕴含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仰、价值取向、文化追求，其设定与实施对于纪念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仪式”做出界定后，作者进一步提出了“仪式”的功能，如“纪念仪式使纪念活动走向规范化，仪式具有强化秩序的功能”“纪念仪式能增强政党与国家的凝聚力”“仪式与象征既可以表达权威，又可以创造和再造权威，他们与权力关系相互依存、互为因果”<sup>②</sup>。

然而，无论是引用郭于华此书中的结论，还是作者概括的仪式的“增强政党和国家的凝聚力”功能，均未能在文章所描述的史实中得到证明。政党与国家的凝聚力如何体现？“仪式”对内规范纪念活动、对外协调国际关系的功能都实现了吗？这是中共对仪式的设计及功能的期望，但从历史因果关系的角度而言，却是难以证明的结论。

① 魏建克：《21世纪以来中共纪念史研究：一个文献综述》，《重庆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② 陈金龙：《中共纪念活动与党史文化的建构》，《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11期。

此外,朱斌的《纪念活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仪式维度——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大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一文,提出“纪念活动就是依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则,对人或事进行追思、怀念的一种仪式。党的历史上很多纪念活动都是以仪式形式出现,仪式活动尽管表面上表现为一套程式化的行为模式,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文化理念,蕴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纪念活动借助仪式程序、仪式空间、仪式符号等仪式谱系来传递纪念信息,实现纪念价值,表达纪念意图。1、建构纪念仪式程序,统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记忆主题。2、建构纪念空间,塑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记忆载体。3、建构纪念符号,传递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记忆信息。”<sup>①</sup>文中将仪式的程序、空间、符号等要素引入中共纪念活动的分析之中,进而提出纪念仪式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功能。这些要素的引入,对于细化对中共纪念活动的分析无疑是有帮助的。然而除此以外,是否还有其他的维度和要素?文章的目的并非在于解决这一理论问题,因此也没有对此进行详细论述。此外,构建纪念仪式程序、纪念空间和纪念符号,其视角无疑都来自中共自身,这也限制了中共纪念史研究的视野。

可以看出,上述文章都提出了中共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在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的意义,这无疑是在中共纪念史研究的重要旨趣。但从当前学界对仪式与仪式理论在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中的运用来看,似乎体现了一条从“仪式”的经验判断到“仪式理论”运用的主线,其中至少有三个重要的环节值得进一步思考。

其一,“仪式”内涵的界定问题。中共纪念活动多种多样,具备哪些要素才可以被称之为“仪式”?只有找到“仪式”和中共纪念活动中所共有的因素,才可以进一步概括、总结、提炼出适用于中共纪念史研究的仪式理论。

其二,“仪式”理论更多的是从更细微的视角对纪念活动的各个成分进行分析,增强了纪念活动研究的系统性。但纪念活动史既然是一项历史研究,对其变迁过程及原因的探究终究是题中应有之义,仪式理论对纪念活动的历史变迁解释却较为乏力。

其三,“仪式理论”在西方学界特别是人类学领域有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基于中国本土的仪式理论似乎尚不成熟。中国传统历史中并非不重视纪念仪式,典型的如祭孔仪式等,现代中共的纪念仪式与之相比,是否有所关联?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根源与文化根源应从何谈起?

## 二、仪式概念的磨合

要将仪式理论引入中共纪念史研究,仪式概念的界定及其与纪念活动涵义的磨合应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正如有学者言:“问题的本质在于,仪式一词所涵盖的现象实在太广了,所以不可能有一种具体的特征能够在所有仪式中都存在。为此,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要给仪式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是不可能的。”<sup>②</sup>20世纪70年代以来,仪式越来越成了一个涵盖一切的术语。有的学者为此甚至觉得再用这个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因为它包揽了一切,所以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sup>③</sup>。但是,对于中共纪念史研究来说,是否有可能从“仪式”的某个侧面勾画出其与“中共纪念活动”关系的轮廓?

<sup>①</sup> 朱斌:《纪念活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仪式维度——以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重大纪念活动为考察对象》,《广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8期。

<sup>②</sup> [荷]扬·斯诺克:《仪式的定义》,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 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sup>③</sup> [荷]扬·斯诺克:《仪式的定义》,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 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第9页。

纪念是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这一过程可称之为“活动”。在中共纪念活动中，“事物”可以指纪念文章，但“事物”显然不会自己表示什么纪念，纪念文章也是由以中共为主体的对象所书写或发表。典型的“行动”则可以是一次纪念活动会，同样是由中共的政治行为所主导，以纪念对象为中心发表讲话、文章，进行座谈等方式，以此来进行纪念。当然，纪念形式可以丰富多彩，如进行各种集会、报告会、学术讨论会、表演、游行等。

那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共为何要举行纪念活动？中共纪念活动的目的是什么？仅仅是为了表示对某个人或事的怀念吗？显然不是。因此，几乎所有的纪念活动结束后，中共都在报刊上发表宣传文章，意在扩大纪念活动的辐射范围。那么，譬如在革命年代，中共影响下的党员、根据地或解放区的群众都共同注意到了中共的纪念活动。同时，中共也努力将纪念活动的影响推向非解放区甚至海外。如此，纪念活动中所体现的、纪念活动背后所蕴含的中共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便能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当然，中共纪念活动的目的不仅限于此，如至少还应包含动员群众的目的等。从这一角度来看，纪念本身显然不是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纪念活动可与仪式联系起来。有研究者指出，“仪式”一词来源于英文的“ritual”，其原意是指“手段与目的并非直接相关的一套标准化行为”<sup>①</sup>。郭于华在《仪式与社会变迁》中认为，仪式通常被界定为象征性的、表演性的、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套行为方式。它可以是神圣的也可以是世俗的活动，这类活动经常被功能性地解释为在特定群体或文化中沟通、过渡、强化秩序和整合社会的方式<sup>②</sup>。

那么，中共纪念史研究中“仪式”的涵义到底该如何界定？西方语言中的仪式概念，如Ritual、Rite又何以被译为“仪式”？

事实上，传统中国文献中很早就出现“仪式”这一用语。诗经中的《周颂·我将》就有：“我将我享，维羊维牛，维天其右之。仪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这里的仪式指的是法度或典章制度。宋代《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九记载，《六典》曰：太常博士掌辨五礼之仪式，本先王之法制适变，随时而损益焉。凡大祭祀及有大礼，则与卿导赞其仪。凡王公已下拟谥，皆迹其功德而为之褒贬。《六典》中的“五礼之仪式”，清楚地显示了这一时期“仪式”的涵义乃偏重于规制，而“礼”的涵义则更接近今天仪式的一般意义。

到了清末民初，“仪式”的涵义仍未引申为典礼的程序。《清史稿》<sup>③</sup>中就有数次出现“仪式”。如此书卷九一，“志”第六六有“十宾礼”，其中记载“外国公使觐见礼”：“康熙初，外洋始入贡，中朝款接，稍异藩服。南怀仁官钦天监，赠工部侍郎，凡内廷召见，并许侍立，不行拜跪礼。雍正间，罗马教皇遣使来京，世宗许行西礼，且与握手。乾隆季叶，英使马格里入觐，礼臣与议仪式，彼以觐见英王为言，特旨允用西礼。”此处即出现“礼”也出现“仪式”，而仪式的涵义仍然是规制。《清史稿》的写作始于1914年，这一时期正值白话文运动前夕，因此传统的“仪式”涵义并没有“典礼”的引申，而主要是以“规制”“程序”的意义出现。因而，在中国传统典章文献中，“礼”的涵义事实上更接近于今日的仪式。

《辞源》中对仪式的界定是“法度，标准。”<sup>④</sup>《王力古汉语字典》中“仪”的涵义：“容止仪表。诗大雅烝民：令仪令色。引申为礼仪，行礼的仪式。诗小雅楚茨：献酬交错，礼仪卒度。又为

① 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② 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1页。

③ 赵尔巽：《清史稿》，民国十七年清史馆本。

④ 《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84页。

法度，准则。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sup>①</sup>“式”则为：“法，榜样。诗大雅下武：下土之式。毛传：式，法也。”<sup>②</sup>因此，古代汉语中的“仪”“式”事实上同指法度、准则。如上所述，这一主要涵义的使用也延续至近代汉语变革以前。

相较之下，“礼”的涵义则丰富得多。《辞源》中对“礼”的定义是：规定社会行为的法则、规范、仪式的总称。论语为政：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荀子论礼：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sup>③</sup>。也就是说，礼事实上包含仪式，并且在文化意义上比仪式涵义更为丰富。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礼”是最普遍的社会规范，所谓“礼有五经，莫重于祭”，而传统国家的祭祀唯有通过仪式来呈现。有研究者曾指出：“礼治是治理社会的一种很特别的方法。除了中国以外，从来没有其他的国家使用过类似礼治的办法来调整社会关系，从而维持社会秩序。这并非说礼仪这种现象是中国独有的——此现象是很普遍的，任何文化都具有的——可是只有在中国传统中各种各样的礼仪被组织得异常严密完整，而成为社会活动中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系统。”<sup>④</sup>大卫·科泽也曾提出：“因为仪式是非语言交际行为，所以它们不会造成口舌之争。由此，可以利用他们促成意愿和行为的和谐，并避免唤起敌意；如果一个人发现他自己按照指定的要求参与到礼(仪式)之中，就意味着他已经——可以说是在事实上——与他人和平共处了，就像舞者要按照乐队演奏的节奏起舞一样，他也尽在仪式的摆布之中。”<sup>⑤</sup>

国家祭祀是“礼”的重要组成，在传统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有研究者曾界定“国家祭祀”：由各级政府主持举行的一切祭祀活动，其中既包括由皇帝在京城举行的一系列国家级祭祀礼仪，也包括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活动，因为相对于民间社会而言，他们就是国家；就祭祀的目的而言，这种活动不是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政府行使其职能的方式，本身具有“公”的性质<sup>⑥</sup>。

虽然传统国家祭祀是由皇帝主持的大型祭祀，普通民众很难直接参与，但由于王朝中央举行的国家祭祀与地方政府举行的祭祀一般具有同时性和同构性，足以让各阶层民众感知国家的祭祀行为，并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文化心理，从而增强国家权力在社会各领域的有效性和神圣性<sup>⑦</sup>。以历代王朝祭孔为例，一般有三类：一是在中央太学的孔庙举行祭祀，二是在孔子故里曲阜阙里举行祭祀，三是在州县学校举行祭祀<sup>⑧</sup>。可以看出，这一过程与中共纪念活动的运作模式有很大的相似性。当中共中央举行某个重要人物或重大事件的纪念活动后，各地党组织往往随之展开相应的纪念或学习或宣传，将中央纪念活动的意图与精神贯彻和传播至地方社会之中。可见，传统中国的祭祀对象、参与祭祀的各级人物、祭祀祭文和中共纪念活动中的对象、纪念活动的各级组织、纪念文章等都存在很强的形式同构性(尽管他们在纪念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

有研究者指出：“当代社会背景下，虽然古代中国‘国家祭祀’之类的政治仪式发挥政治功能的社会环境已不复存在”，但“在许多当代中国人心里，传统的政治文化仍然在起作用，传统的

① 《王力古汉语字典》，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9页。

② 《王力古汉语字典》，第284页。

③ 《辞源》，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497页。

④ [法]汪德迈：《礼治与法治——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与西方传统的JUS(法权)制度之比较研究》，《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89年版。转引自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前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⑤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第18页。

⑥ 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第3页。

⑦ 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第8页。

⑧ 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第95页。

合法性信仰没有发生根本的转变。……近年来，中国各地纷纷举行祭祀中国传统的人文祖先如黄帝、炎帝、大禹或圣人先贤如孔子、孟子等的大型活动，虽然各地在举行这些祭祀活动时，均隐含着经济指向的目的……但是这些祭祀活动能够顺利地被人们所接受，正是借助于一种延续数千年的传统潜意识力量。”<sup>①</sup>当代社会，传统中国的诸多祭祀已经失去其生存的土壤，然而作为一种政治仪式，纪念活动可以说是传统“祭祀”现代转向的一种类型。

综上所述，“仪式”的涵义在传统与现代中国经历了明显的变迁过程。传统中国的“礼”更接近于今天一般意义上的仪式。因此事实上，政治仪式早就是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纪念活动中的仪式问题已成为研究者关注的一个学术领域，那么，研究中共纪念活动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在政治和社会运作层面的作用和意义，研究中共何以采取这样一种政治仪式，便不能不考虑其与传统中国的政治仪式的延续性，唯有如此，中共纪念活动的文化脉络和历史根源才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中英文的互译过程中，有几个英文词汇都可翻译为中文的“仪式”含义。如Rite的两个涵义：一，庄严或宗教仪式，以既定或规定的方式或构成或伴随的词语或行为；二，任何正式的惯例或习俗<sup>②</sup>。另外如Ceremony的涵义：正式的行为或仪式，或严肃的仪式，按规定的方式进行<sup>③</sup>。

在西方，学术意义上的“仪式”出现的时间也并非久远。有研究者指出：“‘仪礼’(ritus)在1871年第一次以它的拉丁文形式出现。提勒在1873年第一次使用它，指的是较早期的宗教。……提勒、香佩特和奎能在1880年之后开始使用‘仪式’(ritual)和含有贬义的‘仪式主义的’(ritualistic)……三者后期使用‘礼仪’、‘仪式’和‘仪式主义’时主要包含三层意义：(1)指代按照规则进行的宗教行为(ritus)；(2)有时也用来专指17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仪式手册(rituale)；(3)和‘崇拜’、‘庆典’、‘仪礼’、‘敬爱’等词语广义地等同起来使用。”<sup>④</sup>此后，“‘礼仪’和‘仪式’逐渐在19世纪宗教学者出版作品中代替传统的术语，其主要原因是它们与一些传统的术语如‘庆典’‘祭祀’相比，更适于用来科学地、客观地描述世界上各种文化的宗教行为。无论是神学家还是与宗教无关的世俗学者都认为，‘迷信’最终会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消失。这就要求学者们中立、客观、理性地来感知他们的研究对象”<sup>⑤</sup>。

西方的“仪式”概念内涵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扬·斯诺克列举了四种具有代表性的仪式定义：第一，仪式这个词，指的是人们不运用技术程序，而求助于对神秘物质或神秘力量信仰的场合时的规定性正式行为。第二，仪式是一种由文化来建构的象征性交流。它由模式化的、有秩序的一连串词语和行为构成，经常在多媒体中得以表达，其内容和安排表现出各种不同程度的正式化(习俗化)、模式(严肃性)、集中(混合)和循环往复(重复)。仪式在建构特征上是表演性的。第三，仪式是由社会来规范化的、重复的象征行为……仪式行为带有正式的品质，是一个高度结构化的、标准化的系列，并常常在自身也带有特殊象征意义的特定地点和时间上被上演。仪式行为是重复的，因此也是循环往复的，但这些都服务于重要的意义并用于疏导感情、引导认知和组织社会群体。第四，仪式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系列多多少少都带有不变性的正式行为和语言的表

① 廖小东：《政治仪式与权力秩序——古代中国“国家祭祀”的政治分析》，第232页。

② 1, a solemn or religious ceremony performed in an established or prescribed manner, or the words or acts constituting or accompanying it; 2 any formal practice or custom. “the reader’s digest great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Funk & Wagnalls standard college dictionary 1975, 1161.

③ 1, a formal act or ritual, or a serious of them, performed in a prescribed manner; “the reader’s digest great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Funk & Wagnalls standard college dictionary 1975, 223.

④ [荷]扬·普拉特弗特：《世俗和宗教的仪式》，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 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第49~50页。

⑤ [荷]扬·普拉特弗特：《世俗和宗教的仪式》，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 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第51页。

演,其符码并非完全由表演者们来设定<sup>①</sup>。

综上所述,西方“仪式”的上述定义,与中共纪念活动颇有差距。第一,“求助于神秘力量”显然并非中共纪念活动中所必须存在的。第二,“表演性”似乎也并非中共纪念活动的普遍特征。第三,仪式行为是重复的,虽然中共某些纪念活动定期举行,但内容不尽相同,某一些纪念活动则可能仅仅举行一次。有的纪念活动并非在固定的时间重复进行,中共往往根据特殊的外部环境进行调整,适时进行纪念活动,而非机械地重复。因此,有的人物或事物的纪念可能数十年才出现一次。因此,若严格按照西方的仪式定义,或许仅有极小一部分的中共纪念活动可以被称为仪式。

“仪式”涵义在西方近代史中的这一变迁过程,似乎可以提示我们中文语境中“仪式”涵义近代转向的原因。传统中国的“礼”固然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仪式”,但“礼”的背后是深厚的儒家思想、等级观念,在近代反思儒家思想、语言变革过程中被弃用亦合情合理。相较而言,本指法度、规则、程序的“仪式”之涵义更加符合客观、科学语言表达的需要。

因此,中国的“仪式”与西方的“仪式”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中国的“仪式”抑或“仪式理论”与传统的“礼”及儒家传统有着深刻的文化因缘,而西方的“仪式”理论却具有深厚的宗教背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心理导致民众对仪式产生出不同观感和接受程度,仪式的效力因此也不可能完全一致。从这一角度而言,由于理论基础、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等因素的不同,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在借鉴西方仪式理论上,必然存在诸多限定性条件。

### 三、仪式理论的启示

由于“仪式”所涵盖的范围太广,大卫·科泽为了避免陷入无谓的争论,转而强调指出:“当然,在定义仪式时,我并不想去揭示什么是‘真正的’仪式,因为它不是一个可被研究的实体。我们倒不如说仪式是一种分析类型,帮助我们处理混乱的人类经验,将之整理成井井有条的框架。”<sup>②</sup>虽然政治学中的“分析类型”,并不能直接转化为历史学研究中运用的理论,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仪式”作为一个研究视角,对深入理解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脉络、丰富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叙事来说是有所助益的。

仪式理论对于深化中共纪念活动中各种组成要素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启示价值。例如在研究纪念活动的过程中,参与者的位置是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细节。“政治仪式依靠一套规范系统对承载权力信息的身体作出严格安排,主要有两种具体策略:一是限定身体在政治仪式中所处的位置,从而保证作为权力符号的身体符合政治仪式这种权力话语系统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目的;二是确定身体在仪式操演中的行动次序,保证权力信息的流通和交换不受阻滞,这正是权力生产的动态过程。对身体位置及其行动次序的控制维持着政治仪式的连续性,在周而复始的操演行为中,仪式中的权力获得了累进性的合法性资源。”<sup>③</sup>在中共的纪念活动中,每一位参与者的位置几乎都经过细致的考量。身体的位置及其在仪式过程中的活动,对于仪式本身的总体表现均有重要意义,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对中共纪念仪式过程细节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纪念仪式的地点场域是影响仪式效果的重要因素。安克斯密特指出:“通过将我们想

<sup>①</sup> 参见[荷]扬·斯诺克:《仪式的定义》,王霄冰主编:《仪式与信仰 当代文化人类学新视野》,第6页。

<sup>②</sup> [美]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王海洲译,第11页。

<sup>③</sup>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第182页。

要记住的特定事件与其所发生的地点(或者是与我们着意将之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地点)相关联,我们可以成功地为我们的记忆提供最佳支持。我们回忆起地点——接着事件本身不可避免地来到我们的记忆中,因为我们已经学会将它与特定地点联系在一起。”<sup>①</sup> 仪式地点的选择,体现出主创者对仪式本身重要性的认知及对特定仪式的预期目的。因此,研究中共纪念史,不能不研究纪念仪式的安排或发生地点,由仪式地点可以观察中共纪念活动的特殊意义。

又如在纪念仪式中出现的音乐,是纪念仪式上的礼乐形式,这种礼乐形式也是中共纪念仪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王海洲指出:“仪式与音乐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两者相辅相成,如神灵的声音寄居于宗教仪式中,群众的声音掩藏在民间仪式中,而当权者的声音体现在国家仪式中;另一方面,音乐在某些情境中直接展现出一种‘仪式性’……音乐在很多政治仪式中扮演着指挥官的重要角色,它作为‘一种组织原则’控制着政治仪式的节奏,调节着政治仪式的气氛,甚至安排着政治仪式的全进程。对这些政治仪式来说,具有政治意义的音乐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内容,它将参与者带入特殊的政治情感体验中,成功实现政治价值的构建和宣示——这种‘政治定调’即展现出仪式的政治动机,又实现了仪式的政治功能。”<sup>②</sup> 研究纪念仪式中的音乐问题,将音乐的艺术表现形式及其表现力与特定的仪式结合起来,对中共纪念仪式过程的理解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在仪式理论的分析框架下,研究者可以发掘中共纪念活动中更多的维度和视角。视角的开阔,使得原本被“忽略”的面相在研究中被重新发现,这对中共纪念活动叙述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全面性无疑大有帮助。

但是,中共纪念史作为一项历史学研究而言,仪式理论的运用还有一个关键性问题亟需解决,即“仪式”对中共纪念活动历史变迁因果关系的解释。正如巴林顿·摩尔所言:“文化或者传统(用一个不那么技术性的术语)并不是一个处于共同生活于社会中的人类个体之外或独立于这些个体而存在的事物。文化价值并不是从天而降来影响历史进程的,它是观察者个人得出的抽象概念,其建立的基础是观察者对人群在不同的情况下,在一段时间内,或者在这两者兼备的条件下的行为方式方面的相似性所进行的观察。尽管人们时常能够基于这些抽象概念,对群体或个人在短期内的行为方式作出精确的预测,但是这些抽象概念仍然无法解释其行为。从文化价值观的视角来解释行为就是在进行循环推理。”<sup>③</sup> 也就是说,研究者通过对大量中共纪念活动史料的阅读、感知,得到中共纪念活动乃是一种“政治仪式”的印象,反过来又以仪式理论来描述这一历史活动,且用仪式的各种功能来说明纪念活动,极易陷入循环论证的困境。因而,这一路径在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因果以及文化根源上并不能得到进一步的解释。这一视角引出的问题则是中共自身如何理解“纪念活动”以及为何会采取“纪念活动”的方式?是中共自身的创造亦或是某种历史继承?政党的纪念活动何以能够在中国的历史环境中起作用,亦或是在何种程度上起作用?上述问题既是仪式理论在中共纪念史研究中所面临的难题,也是未来研究的学术空间。

仪式理论与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的另一个理论难题,是仪式理论在社会学中具有很强的功能主义色彩,当前关于中共纪念活动的研究也处处强调其功能,然而,功能主义在理解历史因果关系上却早已被证明难有说服力。正如郭于华指出,“在处理社会变迁问题时,传统人类学的功能

① [荷]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4页。

②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第151~153页。

③ [美]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

主义解释显得软弱无力；而单纯的功能主义立场亦无法解释半个世纪以来作为仪式活动背景的中国社会的剧变过程。”<sup>①</sup>可以看出，这两个理论难题虽来自不同方面，但导致的结果是一致的。

中共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然而，从社会整合的角度而言，其成功了吗？参与活动的人们，都在内心认可这种纪念活动吗？不断的纪念活动，是否会引起“参与者”的疲劳感，以致使仪式的功能和效果大打折扣？这些问题，就需要从“参与者”留下的证据中去描述和解释。

政治仪式的观众有两个主要组成部分，王海洲强调“一是内在于仪式之中的非功能性的参与者，他们在仪式中不承担直接的仪式操演行为，如同仪式的现场见证者，我称之为‘直接视觉受众’；二是仪式之外非在场的观察者，接受的是以文字、声音、图像或影像等载体的仪式信息，无论是读、听还是看，都没有真正的‘身临其境’，因此我称之为‘间接视觉受众’。”<sup>②</sup>在中共纪念仪式中，这一视角尤为重要。因为“直接视觉受众”毕竟有限，而“间接视觉受众”无疑才是数量最大、范围最广、产生意义效果最强的仪式接受群体。那么，这两类受众对纪念仪式的感受如何？其中又有何差异？并且，“受众”本身同样具有历史性，不同时期的受众，受不同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受众对仪式的观感显然不同。此外，“间接视觉受众”是如何与仪式联系起来的？其中的仪式传播空间、路径、方式又是如何？这些无疑都应成为研究中共纪念史不能不注意的问题。

由于许多研究仅仅从仪式的导向或功能的视角对中共纪念活动进行研究，导致中共纪念史研究几乎还停留在“宏大叙事”的层面。这些研究主要基于纪念仪式的主创者——中共自身的视角，其使用的史料大致可以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共历史上形成的各类政治文件，这些政治文件经过日后的收集、整理、出版等程序，成为中共纪念史研究的基本材料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以及历届中共党代会所形成的文献选编如《十八大以来重要文件选编》等。这些文献资料保存着涉及中共历史上举办纪念活动的相关材料，是研究中共纪念史的基础史料。二是各类中共主办的杂志，如《新青年》《向导》《布尔塞维克》《解放》《群众》《八路军军政杂志》《红色中华》《红旗周刊》《解放日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这些报刊杂志为中共纪念史研究提供了两方面的史料信息，一是提供历史上进行纪念活动的信息，二是提供各种不同类型纪念活动的相关内容。这些报刊杂志的主办方都是中共的相关部门或单位，因此它们代表着中共的主要思想，自然也能够反映中共纪念活动的基本性质。

但是，在中共纪念史研究范畴内，这些史料的政治特征非常明显，其来源均属于中共一方，缺少自下而上、自外而内的视角。作为一项历史研究，“孤证不证”是历史研究的基本原则之一，而同一个立场呈现出来的史料，或许仅能展示事件的一个侧面。并且，作为一种政治仪式，它的功能是否能够实现，还必须取决于仪式的另一端——观众。如果仅仅从操办者角度出发进行研究，在事实上就将中共纪念活动的历史简化了，其中的历史情境、细节、矛盾、冲突乃至历史因果关系等复杂性均无法得到较全面的呈现。

这样的研究也引出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触及到“参与者”的观念认同问题，与政治仪式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沉淀因素息息相关，这也是中共纪念活动研究中的难题。在此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参与者”的视角始终难以被描述。

仪式理论与中共纪念活动磨合中的问题提示了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史料收集的新方向。对中共纪念活动的仪式或过程的描述，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史料相互佐证是必要的，这样才可逐步接近纪念史的全貌。当前研究者运用的中共纪念史料多出自中共，其视角自然也不能脱离中

① 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第3页。

② 王海洲：《政治仪式——权力生产和再生产的政治文化分析》，第290页。

共这个政党主体，但如此叙述、建构而成的纪念史就存在难以体现纪念变迁的复杂过程。因此，如何拓展中共纪念活动史的史料范围，特别是挖掘来自受众方面的史料，或者来自纪念活动发生影响方面的史料，就成为拓展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的关键。

## 结 语

综上所述，中共纪念活动及其纪念仪式，在中共政治思想中具有独特的文化意涵，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仅仅依靠政治学中的政治仪式理论，远远不足以对其形成过程作出深刻的解释。从目的——手段的方法论来看，仪式理论对中共纪念活动史的研究具有很好的启示意义。但是，仪式理论运用于中共纪念史研究的理论缺陷，也提出了中共纪念活动史史料收集的新视角。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必须建立在充分的不同立场、不同参与方的史料基础上，从史料中去发现中共纪念活动发生的基础，在思想脉络中挖掘纪念活动与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的历史性关系，这或许是未来中共纪念活动史研究值得进一步深入的方向。

（本文作者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副教授 福州 350108）

[责任编辑：侯竹青]

### 《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1期要目

|                              |         |
|------------------------------|---------|
|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正确党史观和理论品质         | 宋月红     |
| 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         |
| ——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同前两个历史决议的辩证关系     | 张金才     |
| 中国共产党百年国际战略的世界情怀             | 王巧荣     |
|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于新时代研究的指导意义          | 王爱云     |
| 1953—1954年江苏基层普选中选举权审查的偏向与纠正 | 韩同友 金子求 |
| 1949—1958年工矿企业青年工人的技术培养      |         |
| ——以师徒合同为中心                   | 徐雪晴     |
| 1959—1966年上海青年“红旗读书运动”研究     | 齐卫平 刘 骥 |
| 1959年全国急性传染病学术会议的历史考察        | 马金生     |
| 新中国治淮方略演进研究                  | 吴春梅 程春晖 |
|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 丁志远     |
| “156项工程”项目是怎样落地的？            |         |
| ——以湖南为例                      | 易绵阳 曾 鹏 |
| 从制造大国到创新强国                   |         |
| ——海外学者对新中国科技事业发展史的认知与评价      | 于国辉     |
| 一部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全貌的著作            |         |
| ——读《当代中国社会史》                 | 黄岑玥     |